



国际人士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我在中国的岁月

【美】海伦·斯诺 / 著
安 危 / 译

The sky before me has been as gray as my spirit these that the laundry offered more m-
in my life. For thirty of work a day, instead of the sunrise-to-
have drunk from night work in a private home. After mu-
itterness left consulting all the neighbors she decided
to start on the mangle at seven dollars a
day as the stiff shirt machine that paid e-
From the first she placed her weekly w-
mother, and only uncle -
lays for herself.
"I've got nice
You can't live lit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国际人士看中国

我在中国的岁月

[美] 海伦·斯诺 / 著
安 危 /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2015 - 5172

© 2015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5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中国的岁月 / (美) 斯诺著 ; 安危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5. 8

(国际人士看中国)

书名原文：My China Years

ISBN 978 - 7 - 200 - 11541 - 3

I. ①我… II. ①斯… ②安… III. ①访问记—美国
—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5745 号

国际人士看中国 我在中国的岁月

WO ZAI ZHONGGUO DE SUIYUE

[美] 海伦·斯诺/著

安 危/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268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1541 - 3

定价：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编委会

顾问：李岩松 王学珍 张注洪 伊莎白

主任委员：何理良

主编：孙 华

编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 珂 王 芳 王学新 王曷灵 尹均生

曲 仲 朱娅丽 刘力群 刘欣欣 安 危

孙 逊 吴松江 张小鼎 陈 飞 陈秀霞

周 浩 柯马凯 俞 玲 袁西玲 贾建弥

高敏娜 梁伯枢 舒 瞇 鲍世修

Shauna Mendini Nancy Hill

总 序

2015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由北京出版集团发起的“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的陆续出版，不仅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纪念国际友人而做的一项有益尝试，而且也是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国际人士的著作。这些作者分别在20世纪中前期亲历、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亲自参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过他们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能建设新中国”这一被历史证明的真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与成果，展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今天的中国梦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立的历史功勋，客观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不走老路、邪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给予了有力的诠释。

阅读这些作品，我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也是我喜爱这套丛书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持有的那种平等、客观、友好的态度，置身于中国最普通的民众

之中，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体会中国人真实的喜怒哀乐，从而由衷地赞颂中国的“无与伦比的劳动阶级”与“正在改变世界的中国革命”。不能否认，近代以来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被扭曲和误解，是若干发霉的历史碎片，是落后愚昧的同义词。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这么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怀抱着对自由、对理想、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崇高憧憬，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毅然来到中国人民身边。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华北前线，在孕育新中国的陕北窑洞，在革命家与普通士兵共同劳动的田间，与憨厚的农民、勇敢的战士和满腔热情的青年共同生活、战斗，与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生命。正是由于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大批的中国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他们用笔记录下了一个苦难而贫弱的中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坚强的、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的存在！在那个时代，这些声音象征着不屈的意志和战斗的信念，鼓舞着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民族，使战火中的人们看到了遥远东方土地上的新生力量。

同样让我感动的是，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支撑这种精神力量的是这样两个词语：理想、信仰。在这套丛书中，作者们记录下了一群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领袖也有青年，生者与逝者、有名者与无名者，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同样的主义——他们叫作中国共产党人，是作者笔下的中国之魂。丛书的作者们以极其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这个崭新的新天地里，没有腐败的官吏，没有麻木的奴隶，也没有鸦片、娼妓，不同于中国

的其他地区，这里是人们用精神信仰建造的现代乌托邦。生活的艰苦和物质的匮乏，改变不了这里的人们那种蓬勃的热情与活力。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们怀着必定胜利的决心，在绝境中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冲锋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因此，我相信，“国际人士看中国”丛书不仅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永恒思念和真挚情感的一种纪念和慰藉，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理想教育和信仰教育的一套优秀文本和绝佳素材。

衷心祝愿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衷心祝愿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何理良
2015.6.3

海伦·斯诺在回忆

一 第一手的

以时代为经、个人阅历为纬的回忆录算不算野史的一种呢？我尊崇史书，但我更爱读回忆录。历史有如树干，回忆录才是葱翠繁茂、供人观赏的枝叶。说来极不应该，对历史书我往往略翻一下即束之高阁，等遇上什么特殊场合（比如说写个注什么的），才搬下来临时抱抱佛脚。在我的书架上，它们就像一辆辆救火车，有它们在，可以放心。可是拿到一本回忆录，即便是很平常的一本，我都像是进了趟馆子，宴席也罢，小吃也罢，总是嚼得津津有味。吃完之后，一路上还难免要咂咂嘴巴。诉之感官的回忆录，能把逝去的日子重新展现在眼前。倘若那位作者还经历过、甚至直接参与过重大历史场面，即属于第一手资料，那就更为珍贵了。

1979年11月，我专程去美国东北角康涅狄格州的那个小镇去访问海伦时，她告诉我，正在写旅华10年（1930—1940）的回忆录。我听了自是十分亢奋。因为那是惊天动地的10年，是中国人民在做自己的主人还是当别人的奴隶之间抉择的10年，也是人类站在重大

十字路口的 10 年，而她和埃德加·斯诺那时都是风云人物。今年 9 月，我在美国中西部时，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回忆录 1981 年就写好了，她还为它犯了场心脏病。回到北京后不久，纽约威廉·莫洛（William Morrow）出版社就受海伦之托，把《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的一份清样寄了过来，并通知说，这部 300 多页的回忆录，定于 1984 年 4 月 28 日由该出版社出版，售价 16 元 9 角 5 分。这样，我就比美国读者早几个月读到了它。

全书共分 4 部分。第一部分“上海”（1931—1932），主要写海伦同埃德加这对从事新闻工作的美国青年从相识到结婚的经过。其间，发生了“一·二八”事件。从作者摘引的家书中可以窥见她最早对中国的一些观察和印象。第二部分“北平”（1933—1937）及第三部分“延安”（1937）显然是全书最重要的章节，其中写了“一二·九”运动，斯诺夫妇先后去陕北访问以及有关《西行漫记》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第四部分“工合”（1938—1940），从抗战爆发后这对夫妇创建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活动写到他们告别亚洲。

书中写了不少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人和事。她在第二部分中，为“一二·九”运动的英雄们，如黄华、黄敬等画了侧影。描述她在陕北那 4 个月的活动时，不但留下了她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领袖的印象，也用了不少篇幅来描写马海德、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的生活和风貌。

尽管书里写的是 40 多年前的事，海伦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不减当年。看她怎样描述 1937 年从陕北到三原之间的印象：

这里，对强奸者处以死刑，但朱德告诉我，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延安实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红军不喝酒，甚至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们都是自愿参加革

命的，没有薪金。他们争相以自我牺牲来立功。他们非常骄傲自己穿的制服，特别是绑腿。每个人都梦想能有一支自来水笔。

她是这样推崇八路军的纪律，这样认识根据地的军民关系的：

所有我们吃的东西，红军每个士兵吃的东西，都是买来的。士兵不睡帐篷；不是住荒屋，就是借住老百姓家。连用一下火炉都照付煤钱，临行总把住处打扫得一干二净，比来的时候还整洁。他们吃的是小米粥，不论多饿，路过果园菜园也没人会想去偷吃什么。在共产运动中，对于私人财产这么尊重，真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正是他们之所以能赢得人心，一直受到群众拥护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变事变后，当她看到原来“剿”共的东北军也能掉转枪口抗日时，作者这样描述她当时的心情：

我对中国的热爱，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爱这些中国学生，爱他们中间每一个人。我爱东北军，爱他们每一个士兵。倘若二十九军的宋哲元老将军肯倒向抗日的一边，我也可以爱他，甚至爱任何跨到这一边的土匪。我爱那些邀请埃德^①去演讲陕北之行、要他放映电影、关心他的考察的传教士。

如果记住她在写“一二·九”运动时对于挥动大刀镇压学生的二十九军多么深恶痛绝，以及她在全书许多地方对在华外国传教士表示的憎恶，就更能理解埋在这段话下面的是多么深厚的感情了。

^① 埃德，埃德加·斯诺的昵称。——编者注

关于斯诺，这本书提供了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海伦在书中以极大的愤慨追忆了美国当时对《西行漫记》的攻讦：

尤其使中国人惊异的，是美国共产党竟然大肆攻击这本书，并不许在他们控制的书店里出售，只因为书中有两三句谈到第三国际在对华问题上犯的错误。埃德一直不能原谅那些猥琐的正统派。他们真是既幼稚又小气。人家风尘仆仆奔到前线采访，而那些学院派先生们从来也没为推进历史尽过一点点力，却只会吹毛求疵。我们当时没意识到那是对毛泽东的间接攻击，因为埃德是从他那里得到的资料。

全书的记述分量较重的，是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对事件的态度那段。这里，海伦首先摘引了1936年12月14日苏联塔斯社那篇令人惊诧的电讯原文：

正当南京政府努力统一中国抵抗外侮之际，张学良本人却对外来侵略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如今，他竟然举起所谓抗日的旗帜，而实际上他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

接着，又摘引苏联《消息报》同日的社论：

过去一年中，南京政府做了相当努力把中国社会所有的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很明显，不管（张学良一伙）喊出什么口号，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不仅威胁着南京政府，也威胁着全国人民。……统一战线应当看作不是反对而是拥护南京政府。

海伦读了这些，简直气炸了肺。她立刻打电话给当时驻北平的塔斯社记者，要求他先不要散发这些通讯稿，她要当面向他提供事变的真相。甚至要求他打电报给莫斯科，指出他们完全搞错了，她愿提供事实。那个苏联记者拒绝考虑。海伦写道：

我的眼泪不禁淌了下来，话都说不出了。我当然知道要是他向莫斯科打那个电报，他会被撤职的，可是比起后果（使中国人民对苏联丧失信心）来，就实在微不足道了。

挂上电话，海伦又要大卫·俞（黄敬^①）到塔斯社去阐明中共的观点。黄敬表示确实难以从命。经过海伦的劝说，可敬的黄敬胸襟毕竟比那个苏联记者要宽阔多了。他事先写好一个备忘录说明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蒋介石企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就同海伦一道去了苏联大使馆——自然也是徒然。

二 啊，美丽的小城

斯诺是1936年在国民党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由西安去的陕北。当时驻在那一带的又是东北军。一路上虽然艰苦，但还顺利。海伦则是转年春天——也即是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把东北军调走，西安改由他的嫡系军队驻守时去的西安。那时，由于头年斯诺冲破了他们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使中国革命在世界舆论面前真相大白，因而国民党对外国记者——尤其斯诺的妻子，倍加戒备。她要从宾馆

^① 黄敬（1912—1958），本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冀鲁豫边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原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编者注

逃出，潜往三原，而派来的大批军警特务却布下天罗地网，就是要她插翅难飞。

西安大旅社^①原来分配她住二楼。为了做逃跑的准备，她先设法搬到有后窗户的一楼来。当时，所有可能为她在西安提供援助的英美传教士都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好不容易她才找到了一个机械师，由于他给一个亲纳粹的瑞典探险家修理汽车，所以国民党对他不加监视。

出逃的那晚，一个叫肯姆普顿·菲奇的同她约好午夜 12 点 45 分以墙头上举的烟头为暗号，然后她要爬一堵墙，再由那人把她领到机械师那里。凌晨城门一开就出发，迟了即便逃出城门，也会中途被截住。

快到约定的时间她就穿上驼绒上衣，披上外套，戴上贝雷帽，并像个逃学的孩子那样把枕头和毯子堆得宛如有人在蒙头大睡。“从旅社大楼到那堵墙只 20 米，可那阴险的月光会把我的影子照到地上，那就准会引起哨兵的注意。”然而她还是冒险登上院里的土坡——她记起“双十二”那晚，邵元冲想逃出旅社，正是在那土坡上被打死的。

约定的时间到了，但是墙头并未出现烟头，而 10 名戴了钢盔的宪兵正在街上巡逻。她又等了 40 分钟，还是没有菲奇的动静。这时，再退回旅社也会被发觉。她说她一向胆子不大，可是由于渴望从西安逃到三原，好去陕北看望红军，就什么都豁出去了。这样，她索性只身闯到旅社大门。守门的哨兵大概事先没得到特务的关照，竟然放她出去了。

① 即西京招待所。——编者注

当她终于辗转逃到根据地边缘的三原时，她感慨无限地学着基督教徒歌颂伯利恒的语气写道：“啊，小城三原，在1937年的春天，你对我来说是多么美丽啊！”

读完这三部分，我不禁想到：一个美国女青年，孤身冒这么大风险，如不是对陕北那颗星有着强烈的向往，是经不起这严峻考验的。

三 抚今追昔

海伦同埃德加结婚近20载，1949年两人离异。分手后，斯诺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她依然赞美备至，说她是“美貌与智慧二者罕见的结晶”。1979年我访问海伦时，她对埃德加也没半句恶言。这很值得尊敬。可以说海伦的这本回忆录至少一半篇幅都是一往情深地描述埃德加的为人及工作，有的地方还带有自我批评的意味。例如：

在我们婚后第一年里，我曾强迫埃德成为北平的（外国）人中间衣着最讲究的，要他骑马，锻炼身体……周末要他参加各种爬山的团体。他性格比较被动，需要有人推他，拽他，揪住他不放。这对我可真是吃力啊！可是我非要他各方面都健全起来不可。

第一年末尾，我感到埃德根本不想改变。

他坦率地告诉我说：“我一切照办，只不过是为了求得你点头而已。你怎么还批评我？”他像个小孩子那么迷茫地问我。

他说的全是实话，我哑口无言。

这就是说，婚后第一年，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就显露出来了。然而他们还是深深相爱着，海伦也懂得退却的艺术：

幸亏我还能随机应变，决定从最高纲领退到最低纲领。我决计不再干预埃德了。他为人随和，有风度，只要不强迫他做些他不愿做的事，他是很容易相处的。……他并不懒。他热爱他的工作：写作、报道和旅行。除了美国香烟、咖啡和刮脸刀（这方面他不肯降低西方标准），他并不乱花钱。

我决定坚守几点：一、不惜一切地保持他的健康和工作；二、我自己要力求节省，只在必需品上花钱；三、不再为了缺这缺那而大声叫嚷。……我本不是喜欢自我牺牲的那种人，我生性甚至不知节俭，不像埃德。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做些小的让步。

这样他们才保住了家庭，又继续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正如她在 1979 年同我谈的一样，海伦晚年也有些失误的事。她是个事业心十分强的女人——不然，怎么能在 30 年间，在绝大部分书都印不出来的情况下，写了五十几本书呢！她悔恨把自己的大好年华大都浪费在鸡毛蒜皮的事上了。听听这位离了婚的妻子的自怨自艾吧：

在我们结婚期间，每天吃午饭之前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去打扰埃德，而他的成就也证明他曾好好利用了上午的时间。至于我，总是从早到晚清理着一切，希望争取到一点儿属于我的时间，而总也得不着。这都怪我自己。我有的是雇工，本来也可以像埃德那样上午工作，我却经常替别

人奔忙了。所有我最充沛的精力——早晨的时光，全用来替别人做好事了。当时我一点儿也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我总想，以后会有时间的。其实不然。我所盼望的日子一直也没到来。即便来了，但是精神状态有了变化，也就再不能做早年本来可以做的事了。直到1949年，我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其他杂务上。随后麦卡锡时代的到来，又离了婚，工作一直没做成。

接着，她又唯恐读者会怪到埃德加头上，赶紧补充说：

这可怪不得埃德。我这么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十分生气。……他对我很有信心，尤其对我的写作才能。他实际上认为我有文学方面的天分，我自然也这么认为……尽管我没去尝试。

四 火盆一样的心

此书有些地方写得很风趣。海伦自嘲作“女吉诃德”，并以此作为第十二章的标题。初到西安时，她感到“古老的西安被城墙围起。高大森严的城门好像打定主意不让我这个反孔的、不缠足的美国女青年走进去。”1937年4月海伦住进西安大旅社后，国民党派了7名特务来监视她。其中有一个总站在空地上，仰头死死盯着她的阳台，竟然使她想起了罗密欧！到了延安之后，天天吃米饭馒头，她由于吃不到西方食品感到苦恼。马海德每从她窗下走过时，总先唱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但我感到作者往往在生活细节上太肯花篇幅了。每次宴会（甚

至从西安出逃的那个夜晚) 穿什么戴什么, 家里雇工(住盔甲厂时他们有过 15 名雇工) 的分工等, 都不厌其烦地加以描绘, 而对历史性的重大事件, 有时却一笔带过。例如, 西安事变两个月前(1936 年 10 月 3 日), 海伦访问了张学良。书中对少帅的衣着、神态做了详尽的描写, 而写到实质性部分, 则是这样交代的:

我事先提出 5 个问题, 少帅的答复都恰恰与蒋介石的政策相反。

除引用了张学良一段供发表的书面答复外, 至于她本人提了哪 5 个问题? 张学良口头又是怎样答复的? 只字也没有。

此外, 像她同宋庆龄的多次会晤, 也只是描写了场合, 却忽略了内容。

书中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 有些还颇为严重。例如她说: “鲁迅是当时文艺界的巨擘, 他鼓励全面西化。”又说: “儒家讲求严格的孝道。在共产党之下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忠诚。”她甚至把精神文明同宗教混为一谈。尽管如此,《我在中国的岁月》仍与国外一般写我国的书大不一样。在苦难的旧中国, 当我们外受侵略者的欺凌, 内受法西斯特务统治的黑暗日子里, 海伦同她的丈夫, 从青年时代就把宣传、捍卫中国革命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 这对美国青年曾同我们一道在寒冷的北平街道上跟举着大刀的二十九军搏斗过。他们不畏艰险, 以极大的热情先后奔赴革命根据地, 并且把中国革命传播到全世界去。可以说, 献身中国革命就是斯诺夫妇之间的纽带, 是他们的共同事业。海伦同埃德加在性格上很不同, 然而他们对那时的中国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感。

1932 年他们度蜜月时, 特意到广东中山县去访问了孙中山的故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 PDF 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